

Processo n.º 783/2022

(Autos de recurso contencios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 19 de Outubro de 2023

Assuntos:

- Pressupostos negativos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SUMÁRIO:

I - À luz do entendimento dominant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o centro em torno do qual gravitam as ligações existenciais de uma determinada pessoa. Por isso se pode dizer, pela negativa, que não constitui lugar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aquele que serve de mera passagem, ou aquele no qual uma pessoa está por curtos períodos de tempo, salvo por motivos ponderosos, pois que aí se não encontra a estabilidade indispensável a radicar um centro existencial a partir do qual se possa fundar a formação paulatina, mas consistente, de um vínculo de pertença à comunidade que constitui o substrato pessoal da Região e que, a final, vá culminar na aquisição d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nos termos ficados pelo artigo 24º Lei Básica da RAEM.

II - Resulta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que a Recorrente, nos anos de 2016 a 2021, esteve pouco tempo em Macau (20, 30, 21, 80, 31 e 49 dias, respectivamente) e o filho dela ainda esteve menos dias (1, 3, 1, 2, 0 e 2 dias,

respectivamente), uma tão escassa permanência em Macau, tendo em conta a caracterização do conceito indeterminado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antes fizemos, está longe de ser suficiente para poder suportar a conclusão de que os mesmos aqui tiveram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ou seja, o centro existencial em Macau.

III - A verificação de um pressuposto legal da revog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vincula legalmente a Administração a praticar o acto revogatório, sem espaço para ponderações discricionárias. Ou seja, a manutenção da residência em Macau é um pressuposto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faltando esse elemento, não resta à Administração senão revogar o acto autorizativo, não podendo a prática desse acto ser neutralizada pela invocação do princípio da tutela da confiança, uma vez que este constitui um limite da margem de livre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ocesso n.º 783/2022

(Autos de recurso contencioso)

Data : 19 de Outubro de 2023

Recorrentes : - A
- B (menor, representado pelos pais C e A)

Entidade Recorrida : -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

ACORDAM OS JUÍZES N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e B (menor, representado pelos seus pais C e A), Recorrentes,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s nos autos, discordando do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datado de 14/04/2022, veio, em 31/10/2022, interpor o recurso contencioso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326 a 361,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i. 本司法上訴事實方面，C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之規定，以在澳門購買價值不低於一百萬澳門元的不動產及在本澳信用機構擁有金額不低於五十萬澳門元的不帶任何負擔的定期存款為依據，於 2008 年 11 月 26 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持續批准滿 7 年臨時居留許可，並於 2015 年 12 月 18 日獲澳門貿易促進局主席發出“確認聲明(2274/2007/02R)”以辦理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ii. C 為其配偶 A 及卑親屬 B 提出惠及申請，並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及後，C 一直為兩名司法上訴人提出續期申請，且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iii. 而在上述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到期前，C 在 2022 年 3 月 17 日為兩名司法上訴人提起是次續期申請。

iv. 在提出上述申請前，該局對兩名司法上訴人的留澳狀況進行核實，並因二人留澳日數較少而進行了書面聽證程序。

v. 該局在 2022 年 1 月 6 日發出第 OF/00104/DJFR/2022 和 OF/00105/DJFR/2022 號書面聽證公函，當時因司法上訴人需要留在廣州照顧接受手術及治療的母親而未能在指定期間內提交回覆意見，故透過電郵向該局請求給予寬限期以便提交回覆意見。

vi. 隨後，該局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透過第 OF/00405/DJFR/2022 號公函通知司法上訴人不接納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請求。

vii. 針對上述決定，司法上訴人在 2022 年 3 月 8 日提起聲明異議，最終該局透過第 OF/00881/DJFR/2022 號公函及第 PRO/00637/AJ/2022 號建議書(見原起訴狀文件一)，駁回該項聲明異議，並維持不接納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請求。

viii. 同時，根據上述公函及建議書的內容，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4 月 14 日決定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司法上訴人於 2022 年 4 月 25 日獲通知上述決定。

ix. 司法上訴人於 2022 年 5 月 25 日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見原起訴狀文件二)，直至提起本司法上訴當天，**經濟財政司司長**仍然未有針對必要訴願作出決定。

x. 本司法上訴的法律方面，首先，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行政行為違反法律規定可予以撤銷。

xi. 貿易投資促進局透過第 OF/00881/DJFR/2022 號公函及第 PRO/00637/AJ/2022 號建議書，維持不接納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請求，並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

xii. 事實上，兩名司法上訴人是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第四項之規定以不動產購買人的家團成員身份獲批臨時居留許可。

xiii. 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 條的規定：“本法律的規定不影響適用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國際法文書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法例所載的特別制度的適用。”可見一斑；再者，在同一法律第 104 條規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其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的臨時居留制度」及第 7/2007 號行政法規繼續產生法律效力；

xiv. 值得一提，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的法案中第 4/VI/2021 號意見書第 26 點指出，“26. 是次立法提案旨在規範《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見法案第一條），且無意變更現行就投資或專業資格居留許可所作出的特別規定。”

xv. 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第 2 款第(一)項之規定，C 兩名司法上訴人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需要證明獲批條件的不動產所有權仍為申請人所擁有，以及有關不動產及銀行存款無設定該行政法規第四條所禁止的負擔，結合同一行政法規第 6 條及第 7 條的審批標準，並不需要考慮兩名司法上訴人及其家團留澳時間的多寡；

xvi. 事實上，截至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主席作出被上訴行政行為時，C 仍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前提，因此，不應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

xvii. 雖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規定，第 16/2021 號法律補充適用於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但澳門司法見解認為，在適用上述條文時，應該分析具體實際情況，以及兩部法律的立法意圖及其擬達致的目標，終審法院第 17/2017 號合議庭裁決亦持相同見解。

xviii. 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規定了以購買不動產為理由申請臨時居留的必要條件，其立法目的在於為當時澳門疲弱的經濟吸引新資金，即透過非本澳居民購買本澳的不動產，為澳門帶來新資金。

xix. 可以理解的是，該行政法規的制定機關當時考慮到不動產的購買人(即投資者)大多數會在不同地方購置物業作投資用途，購買物業後亦會出租作為投資回報，可以預見的是投資者並不會逗留在物業所在地，因此，在制定該行政法規時，並沒有將申請人「留澳期間」及「通常居住」作為以不動產購買人申請臨時居留許可及續期的審批要件。

xx. 而且，以申請人「留澳期間」及「通常居住」作為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及續期的審批要件，將會局限投資者必須定期及連續地逗留在澳門一段時間，這是不利於吸引投資者將資金注入澳門。

xxi. 雖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規定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 但是從立法目的層面來看, 倘若如被上訴行政行為所指, 申請人需要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關於申請人「通常居住」的規定, 這樣會與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相違背的。

xxii. 正如《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的法案中第 4/VI/2021 號意見書第 26 點指出, 無意變更現行就投資或專業資格居留許可所作出的特別規定

xxiii. 正如終審法院第 32/2013 號及第 74/2013 號案件均指出, 以購買不動產為條件而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的利害關係人, 只要在提出續期申請時, 維持其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 便可以獲批續期。

xxiv. 而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 該「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僅為「擁有不低於澳門幣一百萬澳門元且無負擔的不動產」及「在本澳信用機構擁有不低於五十萬澳門元且無負擔的定期存款」。

xxv. 這樣,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以兩名司法上訴人的「留澳期間」及「通常居住」作為其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條件, 明顯違反上述條文之規定。

xxvi. 另外,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 是錯誤地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的規定。

xxvii. 相反地, 基於兩名司法上訴人屬在符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第 2 款第(一)項之規定的前提下,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理應維持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

xxviii. 同樣地, 既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制定機關刻意排除申請人留澳期間作為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及續期的要件, 被上訴行政行為以兩名司法上訴人不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 廢止二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 也是錯誤地適用法律規定。

xxix. 綜上所述, 基於被上訴行政行為中決定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 A 及 B 的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的部分, 沾有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屬於可撤銷的行政行為, 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撤銷被上訴行政行為。

xxx. 另一方面,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行政行為違反「善意原則」及「保護信任原則」屬可予以撤銷的情況。

xxxi. 正如上述內容, 兩名司法上訴人 A 及 B 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獲惠及批准臨

時居留許可。

xxxii. 隨後，C 為兩名司法上訴人恆常地向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直至最近一次被獲批的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xxxiii. 而在 C 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為兩名司法上訴人提出續期申請之前，貿易投資促進局為核實二人的留澳狀況，曾向治安警察局索取二人的出入境紀錄並發現異常，故進行了書面聽證程序，而司法上訴人亦在 2022 年 3 月 8 日及 9 日書面回覆意見及相關證明文件。

xxxiv. 需要指出的是，在多次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均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第 2 款第(一)項之規定，向該局提交續期所需文件。

xxxv. 在提出續期申請時，該局從來沒有表示兩名司法上訴人的「留澳期間」及在澳門「通常居住」為申請續期的要件，例如要求利害關係人需要每年在澳門逗留一定期間。

xxxvi. 當時，為著辦理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C 向該局提交了續期所需文件，該局在審理兩名司法上訴人的以往續期申請時，並沒有提出二人大部分時間不是留在澳門，且沒有以澳門為常居地和生活中心作為理由，不批准有關續期申請的決定。

xxxvii. 從兩名司法上訴人首次提出惠及申請至是次臨時居留許可期間內(即 2015 年至 2022 年)，其與配偶及卑親屬的生活情況幾乎沒有改變。

xxxviii. 具體而言，C 及司法上訴人 A 一直在內地工作及生活，而且二人均為獨生子女，近年幾乎都需要留在國內照顧雙方年紀老邁的尊親屬，加上，司法上訴人 B 及 D 分別於 2012 年及 2017 年出生後，二人便一直需要留在國內照顧上述各名尊親屬及卑親屬。

xxxix. 直至 2016 年，司法上訴人 A 獲發澳門保險中介人執照，便自此開始在澳門從事保險業務，隨後，在兩名司法上訴人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續期後，便計劃眾人在澳門的生活。

xl. 然而，自 2020 年初開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國內爆發，為了減少染疫風險，並應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呼籲減少人員流動，故司法上訴人的整個家庭幾乎都留在 XX。

xli. 加上，去年 C 的母親被診斷患上癌症，需要長期從 XX 前往 XX 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司法上訴人的整個家庭只能暫時繼續留在 XX 居住、工作、升學等等...

xlii. 這樣，在以往惠及申請以至續期申請的時段內，兩名司法上訴人亦非大部分時間留在澳門，而 C 為著辦理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及續期申請，C 亦只向該局提交

了續期所需文件，亦獲得批准。

xlili. 兩名司法上訴人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續期後，基於信賴行政當局的認定，在維持臨時居留許可所依據的事實方面未有作出實質改變。

xliv. 然而，該局在審理兩名司法上訴人的留澳情況時，卻指出二人大部分時間不是留在澳門，沒有以澳門為常居地和生活中心，在進行聽證程序後，作出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

xlv. 需指出，兩名司法上訴人在獲臨時居留許可的時段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中關於臨時居留許可及相關續期的規定沒有任何修改或變更。

xlvi. 若然為了取得留澳資格，司法上訴人 A 必須放棄在中國內地的工作，而司法上訴人 B 必須放棄在中國內地的學業，這並非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立法原意，況且，該局認為兩名司法上訴人的條件不符合被上訴行政行為所引用的法律規定，亦不可能批准以往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xlvii. 在兩名司法上訴人的前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獲批後，期間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的變化，且該局沒有指出續期要件出現變更。

xlvi. 在此前提下，C 一直維持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條件和狀況下，且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獲批至有效期為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兩名司法上訴人便合理地期待該局將一直維持其臨時居留許可。

xlix. 換句話說，C 為兩名司法上訴人向該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作為被上訴行政行為決定所依據的法律(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已經存在，在整段臨時居留許可的期間內上述行政法規沒有任何修改或變更。

I. 即使後來出現第 16/2021 號法律，該法律對部分關於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作出修改，但該法律第 104 條及立法意見書已明確指出，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其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的臨時居留制度」繼續產生法律效力，立法者亦無意變更現行就投資或專業資格居留許可所作出的特別規定。

ii. 為什麼該局在審批臨時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沒有變更的前提下，突然對已獲批的臨時居留許可作出廢止的決定？

iii.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第 1 款規定，“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

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公共行政當局與私人均應做善意規則行事及建立關係。”，而同一法律第 2 款的規定，在遵守上款規定時，尤應考慮行政活動使相對人產生之信賴；

liii. 很明顯地，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閣下作出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 A 及 B 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是嚴重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的「善意原則」及「保護信任原則」。

liv. 最後，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行政行為在事實認定出現錯誤可予以撤銷，具體而言，兩名司法上訴人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獲惠及批准臨時居留許可，且在最近一次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提起續期許可申請，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lv. 然而，貿易投資促進局在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內，為著核實兩名司法上訴人的留澳狀況，向治安警察局索取二人的出入境紀錄並發現異常，故進行了書面聽證程序，而司法上訴人亦在 2022 年 3 月 8 日及 9 日提交了書面回覆意見及相關證明文件。

lvi. 隨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4 月 14 日作出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而有關決定以二人極少留澳，且在卷宗資料可見司法上訴人 A 在內地照顧卑親屬，而司法上訴人 B 在內地讀書，判斷其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司法上訴人認為這是在事實層面上的判斷錯誤。

lvii. 事實上，司法上訴人 A 在 2016 年前在 XX 從事教育培訓工作，自 2016 年開始在澳門從事保險工作，從 2016 年開始，其因從事保險業務而需要來往內地與澳門，以便接洽客戶及處理業務。

lviii. 同時，C 與司法上訴人 A 的雙方父母均為內地居民且年紀老邁，加上二人均為獨生子女，因此二人需要負起作為子女的責任，照顧四名長者的日常生活及起居飲食，再者，C 的母親在 2021 年年底患上癌症，需要到 XX 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即使出院後，母親現時仍要每隔二十日前往 XX 醫院覆診，返回 XX 後亦要每周到醫院覆診，以便觀察及控制病情。

lix. 還有，二人的兩名兒子 B 及 D 分別於 2012 年及 2017 出生，現時分別 10 歲及 5 歲，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故二人在兩名兒子的童年時期多花時間進行照料，因此，司法上訴人 A 長選擇在澳門從事保險業，工作時間較為彈性，以便可以日常往來 XX 及澳門照顧各人，並且可以兼顧保險業務。

lx. 需要指出的是，二人的卑親屬 D 並沒有以家團成員身份辦理在澳門的臨時居留

許可，故該名兒子只能在國內生活及升學。

lxi. 因此，司法上訴人 **A** 不可能將司法上訴人 **B** 獨自留在澳門升學及生活，或每天帶同 **B** 來回 XX 及澳門，這樣，要求一名年約 10 歲的小孩獨自留澳生活及升學，並離開家人的照顧，是不合常理的，且嚴重影響其身心發展。

lxii.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司法上訴人 **A** 獲批給臨時居留許可來澳後，考慮到兼顧家庭及事業，於是自 2016 年開始，在澳門投身屬於自由職業的保險行業，具體而言，其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獲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保險中介人執照，並自 2016 年 10 月 27 日起在澳門從事保險代理人業務，至今從未間斷。

lxiii. 司法上訴人 **A** 在從事保險業務之前，其工作及生活圈子主要集中於圈內，因此，其在從事保險業期間，一直以國內的客戶為主，故司法上訴人 **A** 有需要在國內向客戶介紹及推廣「E 保險」的保險產品。

lxiv. 同時，在澳門從事保險業務期間，亦不時參與由「E 保險」舉辦的持續專業培訓課程，並獲得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的百萬圓桌會員資格，因此，司法上訴人 **A** 基於顧及家人及客戶的因素，故亦不少時間需要留在內地，但這樣並不代表其不以澳門以生活中心。

lxv. 然而，眾所周知，自 2020 年年初開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地區，疫情均反覆變化，日漸嚴峻，各國對疫情防控都不敢怠慢。

lxvi. 從新聞及社會傳播媒介不難發現，在密閉的交通工具會有更大受感染的風險，眾多患者在乘坐交通工具前沒有被感染，但因與同一交通工具的確診者共處同一密閉空間，最終亦被感染，或需要送往醫學設施進行隔離觀察。

lxvii. 在疫情初期，大家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並不了解，包括傳播途徑及治療方法，同時，由於卑親屬年紀尚幼及尊親屬抵抗力較弱，司法上訴人 **A** 為減低其個人及家庭成員受感染的風險，以及應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呼籲減少人員流動。

lxviii. 而兩名卑親屬所就讀的學校採取的防疫措施更為嚴謹，每名學童及其同住者（當中包括父母）必須向校方出示其行程卡及粵康碼，以確保學童與同住者沒有離開原居地，倘若同住者有曾經出外紀錄，則可能被校方限制其學童回校，從而影響學童學習進度及校園生活，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再三呼籲市民應減少不必要的人員流動；

lxix. 有見及此，作為澳門市民的兩名司法上訴人，一直響應中國內地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疫措施，減少人員流動，從而降低其個人、家人及本地區的人員受感染的風險。

lxx.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存在三年，但仍然繼續在全球蔓延，同時，不斷出現新的變異毒株，以致確診者死亡率仍屬偏高，老人及兒童染病後的死亡率更為高，即便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在康復後，亦留有各種不可逆轉的後遺症，如極度疲倦、氣短、胸痛或緊繃、記憶力和注意力問題(俗稱「腦霧」)、味覺和嗅覺的變化及關節痛等等。

lxxi. 整體而言，司法上訴人 A 因保險業務的客戶主要在國內，故需要不時留在國內向客戶推銷保險產品，而且其需要照顧雙方父母及未成子兒子，在 2020 年又碰上疫情，所以較少入境澳門，因此不應視為兩名司法上訴人沒有以澳門作為生活中心。

lxxii. 況且，目前國家政策與澳門政府經常鼓勵及呼籲本澳市民融入大灣區，到中國內地尋找發展機遇，若果只是因工作原因而甚少回到澳門，而被認定沒有以澳門為生活中心，則欠缺理據；

lxxiii. 另外，在 2020 年初亦開始爆發世紀疫情，兩名司法上訴人減少回澳的次數並不是不合邏輯和不正常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首先考慮到的一定是健康及安全，其次便是卑親屬正常的校園生活，在上述的各種因素下，導致兩名司法上訴人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甚少前往澳門。

lxxiv. 到了 2021 年下旬，廣東省的疫情稍有緩和，故在 2021 年 9 月，司法上訴人 A 在澳門租住一單位，為日後家人來澳生活作準備，同時，亦為司法上訴人 B 在澳門物色心儀學校。

lxxv. 然而，在 2022 上旬，廣東省地區相繼爆發疫情，區域主要集中在 XX 市及 XX 市地區，考慮到疫情嚴峻，為免減低染疫風險，故只能暫緩來澳計劃。

lxxvi. 綜上而言，被上訴行政行為以兩名司法上訴人的出入境紀錄，以及行政卷果內所申報的資料，便斷定兩名司法上訴人沒有以澳門為生活中心似乎過於片面，且並沒有考慮當中原因。

lxxvii. 這樣，司法上訴人 A 基於盡子女責任將留在年紀老邁的尊親屬身邊照顧，並且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兩名司法上訴人為減低其個人及家庭成員受感染的風險，暫時讓留在 XX 居住及減少留澳次數，不應被視為不以澳門為生活中心。

lxxviii. 這樣，基於被上訴行政行為沾有事實判斷錯誤的瑕疵屬於可撤銷的行政行為，懇請尊敬的司長 閣下廢止上訴行政行為。

lxxix. 基於上述理由，考慮到被上訴行政行為違反法律、違反「善意原則」及「保護信任原則」、沾有事實認定錯誤，屬於可撤銷的行政行為，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第 125 條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20 條的規定，撤銷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4 月 14 日作出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 **A** 及 **B** 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決定。

lxxx. 最後，關於被上訴行政行為宣告兩名司法上訴人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的部分。

lxxxi. 被上訴行政行為認為，基於已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之規定，宣告二人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

lxxxii. 首先，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行政行為不應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理由在於被上訴行政行為屬非有效行政行為，包括沾有錯誤適用法律、違反「善意原則」及「保護信任原則」，以及在事實認定出現錯誤的瑕疵，詳見上述理據。

lxxxiii. 這樣，被上訴行政行為的廢止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部分被撤銷後，就不應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

lxxxiv. 倘若不這樣認為，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37 條第一款 b)項及第 157 條之規定，司法上訴人針對被上訴行政行為提起必要訴願後，被上訴行政行為中關於兩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部分則自此不具執行力。

lxxxv. 因此，在不適用同一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的前提下，亦不應宣告兩名司法上訴人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

*

Citada a Entidade Recorrida, 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veio contestar o recurso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118 a 123,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一、貿促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於 2022 年 4 月 14 日作出的廢止司法上訴人惠及的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不沾有司法上訴人所指的瑕疵。

二、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2 條第 2 款(三)項有關通常居住於澳門的規定適用於司法上訴人惠及的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

三、除了遵守特別法(即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所要求的維持獲批居留許可前題之外，司法上訴人及其惠及的家團成員亦應遵守入境、逗留及定是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

四、因為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其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第 23 條明確規定補充適用入境、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當中包括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五、承上，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2 條第 2 款(三)項明確規定，居留許可持有人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否則其居許可得被廢止。

六、根據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 22 條第 2 款，司法上訴人惠及的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續期取決於其是否符合規範居留的一般原則性法律及法規的規定，在本個案尤指以上有關必須在澳門通常居住的規定。

七、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及投資居留制度的核心價值，倘違反居留許可前題，居留許可應予廢止。

八、司法上訴人並不應透過過往的續期產生合理期待，亦不應明知道其配偶及卑親屬的居留並未符合法律規定而產生僥倖心態。

九、此外，司法上訴人在過往一次續期審批結果通知中已獲提醒有關其家團成員需遵守通常居住的規定，因此其不能主張其對再次獲得續期已產生正當期望或信任。

十、司法上訴人為著維持其獲批的居留許可，應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違反法律的行為並不因為時間過去或行政當局沒有執法而變得合法化，亦不可能對之產生正當期望或信任。

十一、本個案中，在司法上訴人的家團成員未符合法律規定下，行政當局按法律規定執法，並未見任何明顯或嚴重錯誤，故並不違反善意原則及保護信任原則。

十二、行政當局作為法律適用者，必須先對具體的事實情況作出綜合評價，方能判斷具體情況是否符合法律上項法律規定的前題。

十三、為分析是否符合通常居住，除了考慮個人的居住地點以外，還關乎個人的生

活中心及其在該地建立的各種(法律)關係, 且該等關係必需是“實際且固定的”(efectivo e estável)。

十四、司法上訴人不但沒有安排家人在澳生活, 更表示各種理由無法來澳

十五 這表明司法上訴人屬因個人意願將配偶及卑親屬的生活中心維持設定於內地。

十六、從司法上訴的配偶及卑親屬的留澳天數、不在澳的理由及其家人的生活中心等事實可反映出司法上訴人客觀上根本未安排其惠及的家團成員在澳門展開其個人生活, 亦未與澳門建立任何實際且固定的聯繫, 故不符合有關常居澳門的要求。

十七、基於續期程序所審理的標的(即該等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因被廢止而不存在, 故審批續期申請變得無用。

十八、此邏輯及做法符合《行政程序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規定, 所以上述決定並無可被指摘之處。

*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SI emitiu o douto parecer de fls. 314 a 316, pugnando pelo improvimento do recurso.

*

Foram colh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São os seguintes elementos, extraíd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e do processo administrativo com interesse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批示:

批准/Autorizo 建議

主席/Presidente

14/04/2022

*

意見:

同意是項建議書內容，呈本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審閱及批示。

F/執行委員

14.04.2022

同意本建議書內容，經研究分析有關聲明異議，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不接納申請人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決定屬合法及恰當，故建議駁回是項聲明異議，並維持被異議之行政行為。另透過出入境紀錄和卷宗資料，且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的規定，未能反映利害關係人在澳門通常居住，經進行聽證程序，建議呈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閣下行使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過第 68/2020 號批示所授予的轉授權，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2 條(二)項及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的規定，廢止利害關係人 A(A)和 B(B)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並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之規定，宣告申請人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為上述利害關係人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

呈上級 審閱。

G/投資居留及法律廳高級經理

2022 年 4 月 13 日

事由：建議廢止臨時居留許可及續期申請行政程序消滅，以及駁回聲明異議(第 2274/2007/3R 號及第 2274/2007/04R 號卷宗)

建議書編號：PRO/00637/AJ/2022

日期：06/04/2022

投資居留及法律處 G 高級經理 閣下：

1. 申請人 C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四)項及第 5 條的規定，以購買不動產為依據，於 2008 年 11 月 26 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並於 2015 年 12 月 9 日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期間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獲批惠及配偶和卑親屬的臨時居留許可，有關利害關係人的臨時居留許可資料如下：

序號	姓名	關係	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1	A	配偶	2022/06/29
2	B	卑親屬	2022/06/29

2. 為核實上述利害關係人的留澳狀況，本局透過公函向治安警察局索取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紀錄，有關資料如下(見附件 1)：

期間(申請人 C)	留澳日數
2013/01/31-2013/12/31	1
2014/01/01-2014/12/31	3
2015/01/01-2015/12/31	4
2016/01/01-2016/12/31	3
2017/01/01-2017/12/31	0
2018/01/01-2018/12/31	2
2019/01/01-2019/12/31	4
2020/01/01-2020/12/31	0
2021/01/01-2021/10/31	0
期間(配偶 A)	留澳日數

2016/06/29-2016/12/31	20
2017/01/01-2017/12/31	31
2018/01/01-2018/12/31	21
2019/01/01-2019/12/31	80
2020/01/01-2020/12/31	31
2021/01/01-2021/10/31	49
期間(卑親屬 B)	留澳日數
2016/06/29-2016/12/31	1
2017/01/01-2017/12/31	3
2018/01/01-2018/12/31	1
2019/01/01-2019/12/31	2
2020/01/01-2020/12/31	0
2021/01/01-2021/10/31	2

3. 透過上述留澳日數資料顯示，配偶和卑親屬的留澳日數長期維持在雙位甚至單位數字，從其等每年的出入境紀錄可見，配偶基本上每月來澳只有 2 至 3 次，最多來澳的月份只有 11 次，平均停留數小時後即日出境，亦有連續五個月沒有入境澳門；而卑親屬全年入境次數不多於 2 次，每次入境後逗留亦最多 2 日，難以反映其等頻繁及有規律來澳。而且，從卷宗資料得知，配偶和卑親屬均在中國內地居住，卑親屬亦在內地就學，以上資料難以反映利害關係人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期間以澳門為常居地，開展日常事務，故認為其等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

4. 基於此，本局於 2022 年 1 月 6 日向利害關係人發出第 OF/00104/DJFR/2022 和 OF/00105/DJFR/2022 號書面聽證公函，通知須於接獲公函起計十日內就上述事宜回覆意見。據郵電局簽收紀錄顯示上述公函於 2022 年 1 月 24 日被成功派遞，本局於 2022 年 1 月 25 日收到申請人的電郵，指出其要照顧在廣州接受手術及治療的母親而未能在指定的十日期限內提交回覆意見，請求給予一個月的寬限期，並承諾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回覆意見(見附件 2)。

5. 基於未見申請人延期回覆聽證的理由具合理性及需要，故本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60 條的規定，不接納申請人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請求，並於同日透過第 OF/00405/DJFR/2022 號公函向申請人作出通知，該公函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被成功派遞(見附件 2)。隨後申請人於 2022 年 3 月 8 日就上述決定提起聲明異議(見附件 3)，是項聲明異議之提起符合《行政程序法典》第 149 條所規定的法定期限。

6. 上述聲明異議主要內容指出，申請人須於 2022 年 1 月 13 日陪伴其剛檢查出患有癌症的母親前往 XX 就醫及手術治療，於 1 月 25 日電郵本局請求延期提交回覆意見並非想拖延時間，並附上母親的病歷報告和證明文件作佐證；此外，還指出其後從廣州返回 XX 家鄉的時候，又遇上疫情而沒有離開原地，當時朋友說要親自來到澳門辦理有關手續，並不知悉可由被授權人提交回覆意見。

7. 同時，申請人於 2022 年 3 月 8 日及 9 日透過被授權人提交回覆意見及相關證明文件，主要內容如下(見附件 3)：

1) 申請人表示原計劃於 2020 年 3 月安排屆時已滿 8 歲的卑親屬入讀本澳小學三年級，無奈於 2019 年下旬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加上封關措施，錯過了報讀學校的時機，考慮到澳門內地雙邊的防疫措施和個人安全，決定維持卑親屬留在原地就學；

2) 申請人指出配偶自 2016 年 9 月 23 日獲發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後，便開始在澳門尋找工作，為兼顧家庭和事業，配偶於 2017 年選擇工作時間較為彈性的保險中介人職業，且為照顧內地客戶，經常澳門內地兩邊往返，配偶自 2019 年至今一直維持保險業 MDRT 的國際殊榮。此外，配偶因照顧在內地就學的卑親屬，在工作以外大部份的時間都會返回內地，以致其留澳日數較少；

3) 申請人(即配偶及卑親屬的家庭成員)則基於照顧退休的父母和在內地經商的原因而不在澳門；

4) 申請人在澳門已購買不動產，即使利害關係人不因經商、照顧家人，或者出外讀書，但並沒有放棄在澳門常居的念頭；

5) 申請人提交配偶在澳的任職證明文件和卑親屬在內地就學的證明文件，並請求維持二人的臨時居留許可。

8. 就上述聲明異議及回覆意見，茲分析如下：

1) 針對申請人就不批准其延期提交回覆意見所提起的聲明異議，須指出，申請人在提出有關請求時並沒有就其所陳述因需陪同母親出外就醫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87 條第 1 款規定作出舉證；其次，即使申請人因疫情而無法離開原地返回澳門，其可透過被授權人代為提交，更何況申請人曾透過授權他人作出“諮詢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狀況”和“簽署聲明文件及簽收文件”的行為，而且申請人是次回覆意見亦授權代理人提交，相關事實與申請人所主張“不知道可以由他人代交或授權他人代辦”的理由不符，更重要的是當中未見申請人具有延遲提交回覆意見的合理性及需要；

2) 經研究分析有關聲明異議，基於上述理由，認為本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作出不接納申請人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決定屬合法及恰當，故建議駁回是項聲明異議，並維持被異議之行政行為。

3) 此外，關於利害關係人的通常居住問題，透過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紀錄顯示，配偶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間大部份時間不在澳門，各年留澳日數只有雙位數字，儘管回覆意見指配偶在澳門任職保險從業員，並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首次獲發保險中介人執照，然而事實上，自上述簽發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間配偶平均每月來澳約 3 次，最長留澳不超過 11 日，最短 1 日，有時早上入境，中午或下午出境，有時中午入境，下午或晚上出境，由此反映配偶每年留澳時間極少，出入境次數亦不頻繁，進出澳門的時間也無規律；即使配偶在澳門從事保險的職業，但未見其頻繁及有規律來澳；

4) 從卷宗資料得知卑親屬不在澳門讀書，自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間大部份時間都不在澳門，各年留澳日數只有單位數字，全年來澳次數不多於 2 次，每次逗留的時間亦不多於 2 日，甚至 2020 年更無入境紀錄，可見卑親屬每年留澳時間極少，出入境次數不頻繁；通常即日出入澳門境，有時早上入境，中午離境，有時中午入境，下午或黃昏出境，進出澳門的時間也無規律；

5) 上述利害關係人的留澳狀況並不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所規定的“頻繁及有規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就學、從事有償職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的前提；

6) 回覆意見指因卑親屬在內地讀書而不在澳門，其後基於疫情關係，於 2020 年錯過了入讀澳門學校的機會。須指出，卑親屬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一直都沒有在澳門開展日常生活事務，從卷宗資料得知卑親屬在 XX 市就讀及居住，期間從未回澳求學。申請人作為卑親屬的法定代理人且為澳門永久性居民，在卑親屬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仍選擇安排其在澳門以外地方生活及讀書，乃屬個人意願；

7) 按申請人所言配偶在澳任職保險從業員，且在澳門購買了住宅，申請人及配偶理應可以安排卑親屬來澳讀書，配偶亦可以在澳門照料卑親屬，當中未見存在阻卻卑親屬來澳開展生活的客觀因素；

8) 即使在疫情肆虐期間，本澳並沒有任何一則行政長官批示或命令禁止澳門居民入境，換言之，卑親屬仍可在遵守相關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返回澳門入讀小學。因此，申請人的主張並不構成阻卻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期間來澳生活的合理理由；

9) 回覆意見又指配偶為兼顧家庭和事業，因此選擇工作時間較為彈性的保險業，工作以外時間便返回內地照顧在內地就學的卑親屬。如前所述，配偶可以安排卑親屬來澳門就讀以便其獲得照料，配偶除了獲得澳門保險中介人執照外，卷宗內未見相關文件反映其與澳門建立緊

密且穩定的連繫；

10) 根據申請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申報的內容，申請人於中國廣東省 XX 市工作及居住(見附件 4 第 1 和 3 頁)，結合其前述極少的留澳日數，可見利害關係人的家庭成員(即申請人)長期都不在澳門；

11) 雖然申請人在澳門購買不動產，但從卷宗資料可見，配偶及卑親屬與申請人同住於內地，結合其等出入境紀錄，難以反映利害關係人在澳門設有慣常居所；

12) 總結而言，透過出入境紀錄及卷宗資料文件，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所指之各種情況，難以體現利害關係人屬於暫時不在澳門的情況，通過利害關係人的個人、家庭、日常生活事務等方面未見配偶及卑親屬與本澳之間存在緊密且實際的聯繫，未能反映其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以澳門為其工作、學習及家庭生活中心，由此得出利害關係人沒有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通常居住於澳門；

13)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的規定，居留許可持有人不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其居留許可得被廢止。

9. 2022 年 3 月 17 日，申請人為其配偶 A 及卑親屬 B 向本局提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見第 2274/2007/04R 號卷宗)。由於已透過是項建議書建議廢止上述利害關係人的臨時居留許可，臨時居留許可依法被廢止將致使申請人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程序因所擬達致之目的或決定之標的屬不能或無用，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之規定，有權限作出決定之機關得宣告程序消滅。

10. 綜上所述，經研究分析有關聲明異議，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不接納申請人延期提交回覆意見的決定屬合法及恰當，故建議駁回是項聲明異議，並維持被異議之行政行為。另透過出入境紀錄和卷宗資料，且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的規定，未能反映利害關係人在澳門通常居住，經進行聽證程序，建議呈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閣下行使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過第 68/2020 號批示所授予的轉授權，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2 條(二)項及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的規定，廢止利害關係人 A(A)和 B(B)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臨時居留許可，並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03 條第 2 款 b)項之規定，宣告申請人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為上述利害關係人提起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行政程序消滅。

上述意見，謹呈上級審閱及批示。

* * *

IV – FUNDAMENTOS

A propósito das questões suscitadas pelo Recorrente, 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teceu as seguintes doughts considerações:

“(…)

1.

Os Recorrentes vieram a instaurar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o indeferimento tácito do recurso hierárquico por si interposto perante 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dos actos d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de revogação d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EM) da **A** e do filho **B** e de declaração da extinçã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os mesmos, pedindo a respectiva anulação.

A Entidade Recorrida, devidamente citada, apresentou contestação na qual pugnou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Entretanto, a Entidade Recorrida praticou acto expresso de indeferimento, tendo o Recorrente requerido o prosseguimento do recurso tendo por objecto esse acto expresso.

2.

(i.)

(i.1.)

Está em causa n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o indeferimento do recurso hierárquico interposto perante a Entidade Recorrida do acto que revogou 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na RAEM de **A** e de **B**.

Basearam-se essas revogações na aplicação subsidiária das normas da alínea 2) do artigo 42.º e d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por a administração ter considerado que aqueles interessados não tinham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A Recorrente, na petição inicial, começou por imputar ao acto recorrido o vício de erro na aplicação da lei. Em seu entender, a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a RAEM não depende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e, além disso, segundo diz, o seu cônjuge e o seu filho não deixaram de residir habitualmente em Macau.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arece-nos que não tem razão. Procuraremos, de modo breve, justificar.

(i.2.)

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é um pressupost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É isso o que resulta da norma d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a qual é à situação em apreço, em virtude da norma remissiva constante do artigo 23.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vem, de modo reiterado, decidindo no sentido de que a falta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é causa do cancelament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ainda que a mesma tenha sido concedida ao abrigo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cfr., por exemplo, o acórdã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182/2020).

(i.2.)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um conceito jurídico indeterminado que não confere à Administração margem de livre apreciação. Trata-se de um conceito relativo ou de geometria variável em função, que se pode construir, segundo nos parece, a partir da norma do artigo 30.º do Código Civil, a qual, sendo embora uma norma de conflitos, fornece um importante contributo no sentido de uma densificação judicativamente relevante do que seja a residência habitual: «considera-se residência habitual o lugar onde o indivíduo tem o centro efectivo e estável da sua vida pessoal».

A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o centro em torno do qual gravitam as ligações existenciais de uma determinada pessoa. Por isso se pode dizer, pela negativa, que não constitui lugar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aquele que serve de mera passagem, ou aquele no qual uma pessoa está por curtos períodos de tempo, pois que aí se não encontra a estabilidade indispensável a radicar um centro existencial a partir do qual se possa

fundar a formação paulatina, mas consistente, de um vínculo de pertença à comunidade que constitui o substrato pessoal da Região e que, a final, vá culminar na aquisição d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pois que, como sabemos, tal aquisição, de acordo com o artigo 24.º da Lei Básica pressupõe, justament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Face aos elementos de facto que fluem dos autos e que constituíram 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do acto recorrido, parece legítimo concluir que, como a Administração também concluiu, o cônjuge e o filho do Recorrente não têm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Com efeito, resulta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o cônjuge do Recorrente, nos anos de 2016 a 2021, esteve pouco tempo em Macau (20, 30, 21, 80, 31 e 49 dias, respectivamente) e o filho do Recorrente ainda esteve menos dias (1, 3, 1, 2, 0 e 2 dias, respectivamente). Ora, como bem se compreende, uma tão escassa permanência em Macau, tendo em conta a caracterização do conceito indeterminado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antes fizemos, está longe de ser suficiente para poder suportar a conclusão de que os mesmos aqui tiveram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ou seja, o centro existencial

Deste modo, cremos justificada a conclusão da Administr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faltava um pressuposto indispensável à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qual seja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justificando-se, por isso, a respectiva revogação.

(ii.)

A verificação de um pressuposto legal da revog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segundo cremos, vincula legalmente a Administração a praticar o acto revogatório, sem espaço para ponderações discricionárias.

Daqui decorre que a invoc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feita pelo Recorrente na sua doughty petição inicial não possui relevância invalidante autónoma do acto aqui impugnado, uma vez que a Administraçã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3.º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CPA), está estritamente obrigada a observar a lei.

Uma vez assente que o cônjuge e o filho do Recorrente não têm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e que a mesma é um pressuposto da manutenção e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ão resta à Administração senão revogar o acto autorizativo, não podendo a prática desse acto ser neutralizada pela invocação do princípio da tutela da confiança, uma vez que este constitui um limite da margem de livre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O princípio da tutela da confiança apenas pode bloquear a adopção de uma conduta administrativa incompatível com a confiança suscitada na medida em que tal conduta se encontre naquele espaço de livre decisão (assim, MARCELO REBELO DE SOUSA – ANDRÉ SALGADO DE MATOS, *Direito Administrativo Geral*, Tomo I, 2.^a edição, p. 221).

(iii.)

Uma palavra final relativamente ao acto recorrido que declarou extinto o procediment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o cônjuge e do filho do Recorrente, que o Recorrente também impugna, nos termos permitidos pelo artigo 44.º, n.º 1 do CPAC, embora sem invocação expressa desta norma.

Para dizer que também neste particular se nos afigura que o Recorrente não tem razão.

Com efeito, com a revogação d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é manifesto que ocorreu uma situação de impossibilidade legal da respectiva renovação, justificando-se, por isso, a declaração da extinção do respectiv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igo 103.º, n.º 2, alínea b)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Não cremos que faça sentido invocar, como faz o Recorrente, o efeito suspensivo resultante do recurso hierárquico necessário interposto do acto d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IPIM para sustentar a ilegalidade do acto que declarou a extinção do procedimento, quando o acto que constitui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é, justamente, a decisão do recurso hierárquico necessário e não o acto de primeiro grau.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somos de parecer de que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

Quid Juris?

Concordamos com a douda argumentação acima transcrita da autoria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que procedeu à análise de todas as questões levantadas, à qual integralmente aderimos sem reservas, sufragando a solução nela adoptada, entendemos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padece dos vícios imputados pelos Recorrentes, razão pela qual é de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em análise.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À luz do entendimento dominant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o centro em torno do qual gravitam as ligações existenciais de uma determinada pessoa. Por isso se pode dizer, pela negativa, que não constitui lugar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aquele que serve de mera passagem, ou aquele no qual uma pessoa está por curtos períodos de tempo, salvo por motivos ponderosos, pois que aí se não encontra a estabilidade indispensável a radicar um centro existencial a partir do qual se possa fundar a formação paulatina, mas consistente, de um vínculo de pertença à comunidade que constitui o substrato pessoal da Região e que, a final, vá culminar na aquisição d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nos termos ficados pelo artigo 24º Lei Básica da RAEM.

II - Resulta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que a Recorrente, nos anos de 2016 a 2021, esteve pouco tempo em Macau (20, 30, 21, 80, 31 e 49 dias, respectivamente) e o filho dela ainda esteve menos dias (1, 3, 1, 2, 0 e 2 dias, respectivamente), uma tão escassa permanência em Macau, tendo em conta a caracterização do conceito indeterminado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antes fizemos, está longe de ser suficiente para poder suportar a conclusão de que os mesmos aqui tiveram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ou seja, o centro existencial em Macau.

III - A verificação de um pressuposto legal da revog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vincula legalmente a Administração a praticar o acto revogatório, sem espaço para ponderações discricionárias. Ou seja, a manutenção da residência em Macau é um pressuposto d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faltando esse elemento, não resta à Administração senão revogar o acto autorizativo, não podendo a prática desse acto ser neutralizada pela invocação do princípio da tutela da confiança, uma vez que este constitui um limite da margem de livre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

Tudo vist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SI acordam em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mante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

Custas pelos Recorrentes que se fixam em 6 UCs.

*

Notifique e Registe.

*

RAEM, 19 de Outubro de 2023.

Fong Man Chong
(Relator)

Ho Wai Neng
(1º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
(2º Juiz-Adjunto)

Álvaro António Mangas Abreu Dantas
(Delegado Coordenador)
(Fui presente)